

# 音乐地理学与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以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尹勋锋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多元人类文化为一身。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环境和文化意识密不可分,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对它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学科向度中。本文借鉴社会科学的学科理念,提出研究本土音乐文化,在关注音乐本体的同时,更要强调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综合运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拓展音乐研究多维视角是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建构新方向。

[关键词]民间音乐;音乐地理学;音乐人类学;传统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243-03

尹勋锋(1973—),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舞台表演。

(江西南昌 330013)

## 一、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向度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将自己创造的文化通过口耳相传巩固和传承下来,展示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成为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石和文化生命的重要标识”<sup>[1](P93)</sup>。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仅对“音乐”研究的方法界定就历经了15年的研究时间,先后提出了三次方案。先从“在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开始,发展到“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再延伸至“音乐就是文化,音乐学者所做的就是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中不断地论证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不仅是声音,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sup>[2](P32-34)</sup>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斯托克斯也指出:地域或地点是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景,其中,音乐事件展示了地域内涵,反过来,通过音乐也可以构筑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人们可以用音乐来为自己定位,从音乐中认识自身所拥有的身份标识

和自我。<sup>[3](P3)</sup>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也曾将“人地关系”和“区域”这两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和思想,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sup>[4](P266)</sup>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音乐艺术,与其产生地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西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以其浓郁的乡土风格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江西省内已流传千百年,成为当地人民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江西省的音乐学者对本土民间音乐的研究,至今仍较多地停留在田野考察的初级阶段,使用归纳、总结的方法记录乐谱或记述表演过程。虽然这些研究手法是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对待现有的已发掘的本土音乐文化,只满足于把流动的声音和表演画面用文本的形式来“翻译”和“解释”,并以录制音像的形式来留存,已不能适应深入开展音乐学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结合前期的研究心得,主要以研究国家级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宁打鼓歌”为例,

对江西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方法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江西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对待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应当转向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向度,把以往单一的音乐形态研究纳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学科内进行交叉研究,才能更加贴切地理解、运用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

## 二、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音乐地理学是研究音乐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研究“音乐—地貌—人类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sup>[5]</sup>学者可以运用这一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研究“音乐区域”,分析音乐的演化过程及地域扩散的特点,明确区域文化的特征。

音乐人类学主要关注的则是人类的音乐行为方式。将音乐的概念延伸到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的文化范畴,阐释“观念—行为—音乐声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人”的行为,提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在实地考察时所关注 and 采集的,不仅仅是狭义的音乐形态。人类音乐学所倡导的“音乐本体”是“声音本体”和“行为本体”。

如果说“人”与“音乐”的关系,决定了音乐之本身的一切属性,那么,地理因素就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影响到人类的体征特点和性格,并直接作用于音乐的风格特点。“地貌”与“人”的行为相辅相成,它们共同决定了音乐的性质。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两种研究方法之间,所关注的音乐学问题有许多交叉重叠的方面,但音乐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在以往的音乐风格区域划分中已经具有音乐地理学地域空间分布研究的性质,但初期的研究多从音乐形态(旋法、结构等)方面进行“定性”描述,较少探讨音乐风格区域形成过程中的地理环境要素。在音乐区域的空间分布、音乐体裁、音乐形态、方言音调上,严格地按照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研究音乐文化,却是后现代民族音乐研究的新模式。它们有两个不同的学科研究重点。音乐地理学侧重于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而音乐人类学侧重于“人”的观念与行为。如果能对它们之间进行互补运用,可以合理地弥补对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不足。因此,要使音乐研究向更深层的知识构架迈进,必须要求音乐研究者具备广泛的人文知识和修养,善于敏锐地捕捉音乐文化的本质——“人”与“地域”,“观念”与

“行为”的多重关系。它们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 三、以音乐地理学方法研究区域音乐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将地方志、族谱、史书、类书等现存的文化典藏综合起来,搜集、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可使研究具备明确的音乐地理学学科特征。下面以江西为例进行分析:

### (一) 江西人文环境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江西山灵水秀,哺育出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这里自古读书成风。江西哲学家众多,朱熹、陆九渊是理学两大派的开创者;宋、元、明有三部大类书《册府元龟》、《经世大典》、《永乐大典》,主编是江西人王钦若、欧阳玄、解缙。江西史学家在现存的《二十四史》中,共主修五史。元朝马端临是大型史学著作《文献通考》作者。江西诗人、词人、作家、戏剧家众多。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列入唐宋八大散文家。以陶潜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和隐逸诗派,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江西词派,由欧阳修、王安石奠基的主张以理入诗的宋诗派;由黄庭坚开创的倡导言必据的江西诗派,由杨万里首创的致力清新自然的诚斋诗体,由文天祥、刘辰翁等兴起的爱国诗体,由汤显祖开创的以情代道的临川剧派等文学方面的派别,在历史上影响重大。

浓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江西历代歌、舞、戏曲盛行,民间文艺丰富,历代文人都对江西各地民歌有所描述。单是对武宁当地盛行山歌的画面就有“夕阳过处樵歌歇”、“古渡渔歌何处洲”等描述。类似这样的佳句在江西各地不胜枚举,为研究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二) 地理位置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一带,与六省交界,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常态地貌类型以山地和丘陵为主,适合种植水稻,境内拥有许多因地理环境而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色音乐体裁是我省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志。“武宁打鼓歌”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与其他“稻作文化区”的“田歌”,劳动形式和演唱方式不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演唱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武宁大面积的山林地貌,劳动强度很大,需要采取集体劳作、集体换工的方式。由半职业的“歌师”们站在田头击鼓领唱,劳动者紧跟其后和歌,出现一“领”众

“和”的演唱形式,以解除劳作者的疲劳,鼓舞干劲。无论开山锄禾还是采茶,当地一律采用此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演唱,粗犷的风格与武宁多山的地貌密不可分。这也是武宁打鼓歌有别于江西其他地方农事歌曲的原因。因此,在研究口传心授的民间歌曲时,一定要根据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各地的地貌特点来进行音乐结构的分析。

#### 四、以音乐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

根据以上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地域形成了当地音乐的“本体风格”,也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使得我们把专注力再次转向具有共性思维的“人”,以音乐人类学的方法阐释该群体的共同观念。

##### (一) 研究性格、语言、行为所产生的独特音调

江西民歌是即兴性很强的地方音乐体裁。人们会根据山野劳动强度,即兴编配作品。以武宁为例,它属于江西省的赣西北民歌区,从歌唱的内容、结构与气质等方面都体现出当地人的性格、方言和审美共识。武宁方言词汇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古汉语词汇,武宁方言语音系统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古全浊声母,声调有明显下滑的特点,读音仍保持中古时代的不送气的浊音。另外,武宁打鼓歌中常用到的音程以级进为主,二度、三度、四度在某些片断中,频繁出现,领唱与和唱之间还形成了八度的跨越。在旋律进行中曲与词的比例基本上是一音对一字,非常符合山里人直率、豪爽的性格特点。武宁打鼓歌用当地口语化的方言演唱,自然就含有当地人说话的语言、语气和表情形象,这种地方腔调成为歌曲的基本素材,乡土味十分浓郁。

##### (二) 音乐人类学所关注的“生存境遇”

音乐人类学从建立之始就视田野作业为学科的理论基础,只有以面向文化本身的态度并理解其“生存境遇”,我们才可能对其中的音乐行为进行整体的把握。

俗话说“一乡一调”、“十里不同音”。江西口传的非物质音乐文化如果离开了方言乡音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因此,对它的研究和保护、传承一定要依靠当地有着共同方言和音乐审美习惯的当地人。面对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境遇,不但要通过老艺人们传唱、音乐工作者记录的方式来完成“静态”的音乐保护;还要进行“活态”的音乐创作和传承保护。各地文化系统的音乐工作者以本土音乐为基本艺术素材,创作

上演改编后艺术性更强的舞台作品,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活态”保护方法。

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把更多的人文关怀给予老一辈的民间艺术传人们,创造可以施展他们艺术才华的平台。尤其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还很少有人能够继承他们的独特技艺,积极推广民间音乐文化势在必行。据笔者调研,目前把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编成教本,请进课堂的,唯属武宁县。从2009年开始,全县中小学每周一课“武宁打鼓歌”。在武宁当地出台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计划中,乡音文化茁壮成长。

随着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音乐研究理念阐发,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侧重于“民间音乐”的历史性、民俗性、共生性及多元性。在对它的不断认识中,学术界产生了“音乐建构”这一新兴词汇。<sup>[6] (P109)</sup>它向学者提出在对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时,不但要坚守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同时更要强调文化含义,这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延伸,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和解释方法的拓宽。也正是这样的“视野”,为当代学术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原生态传统”的本土音乐,在各地民间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当今社会仍就执著地延续着自身的生命轨迹,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生命……我们相信,江西本土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这一民间奇葩,定会勃勃生机,越开越艳!

#### [参考文献]

- [1] 陈勤建. 中国民俗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2] Merriam P. Alan,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3] Stokes, Martin. edited. *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Berg: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 [4] 陈慧琳. 人文地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5] 乔建中. 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8, (3).
- [6] 吴凡. 民间音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张 丽】